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林继富.重阳节生活传统、文化旨归与品牌建设路径[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4(2):24-31.

# 重阳节生活传统、文化旨归与品牌建设路径

林继富

(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081)

**摘要:**重阳节是民众生活实践和文化创造智慧的结晶,呈现出以线性为核心的生活传统的累层,以及多民族、多地域不同身份民众的多元共生、共享的生活。重阳节核心要素是其意义表达、功能实现的主要方式。新时代,以重阳节核心传统为中心的品牌塑造,成为当代人生活的表现。重阳节品牌建设表达者、组织者,成为重阳节重构的推动者、实施者。各地利用重阳节品牌增强区域性凝聚力和扩散力,重阳节品牌建设成为区域社会发展的强大文化力量。

**关键词:**重阳节;生活传统;文化旨归;品牌建设

**分类号:**K8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1)02-0024-08

对于每个华夏子民来说,重阳节在他们的记忆里永远让人魂牵梦绕,在实践中总是韵味无穷。历代文人以重阳为题创作了许多不朽的名篇佳句,如孟浩然“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王维“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李清照“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毛泽东“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sup>①</sup>这些诗句记录了作者创作时的生活境遇和社会现实,包含了集体生活、民族传统共有的重阳节生活习俗。

重阳节起源于何时,没有确切时间记载,大多是民众的传说和学者的推测。有的学者提出重阳节源于先秦或战国时代,但没有直接证据。从笔者见到的文献看,重阳节在东汉已经被文人提及,魏晋以后各种野史笔记对重阳节的记载相当丰富,说明重阳节在此时已经十分盛行。重阳节风俗因时代变化而不断发生改变,一些节俗消解在传统中,一些新的节

俗又在丰富着重重阳节传统。至于重阳节发展历史的每个时段曾经包含多少习俗,显然难以弄清楚。但是,维系重阳节向前发展的核心传统是可以把握的,这些核心传统不仅成为重阳节意义彰显的要素,而且维系着重重阳节独立的文化品格、道德情感和生活惯制。目前,我国许多地方非常重视重阳节,并且以重阳节蕴含的中华文化基因、普遍价值、地方禀赋实施文化品牌建设,探索出有益的传承实践经验和可持续发展的行动路径。

## 一、传统累层:重阳节起源的基本面相

重阳节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不同时代生活中逐渐累积、完善,其传统构成了稳定要素。具体来讲,重阳节生活传统包括登高、赏菊、饮菊花酒、佩戴茱萸、食重阳糕等内容。重阳节生活传统蕴含了民众辟邪祛灾、祝寿敬老、思乡忆友等文化意义,

收稿日期:2020-12-12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与理论创新研究”(16ZDA162)

作者简介:林继富(1964—),男,湖北麻城人,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俗学与非遗保护研究。

① 孟浩然《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李清照《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毛泽东《采桑子·重阳》:“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其中,尊老、敬老和孝老等道德传统成为重阳节传承、弘扬的主旋律,在此基础上,建构了具有严密文化逻辑、地方语法的重阳节知识谱系和生活体系。

屈原《楚辞·远游》曰:“集重阳入帝宫兮,造旬始而观清都。”<sup>[1](P132)</sup>这是我国最早出现“重阳”的记载,但是,屈原所说的重阳并非重阳节,而是“九重天”,与先秦时期“天有九重,地有九州”的宇宙观念有关,其意义指向是级数,也是具有巫术功能的奇妙数字,赋予了“重阳”特殊的意义。尽管《楚辞》中“重阳”与重阳节没有直接渊源关系,但是“重阳”与九的关系是一脉相承的。

曹丕《九日与钟繇书》曰:“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是月律中无射,言群木庶草,无有射地而生。至于芳菊,纷然独荣。非夫含乾坤之纯和,体芬芳之淑气,孰能如此?故屈平悲冉冉之将老,思飧秋菊之落英。辅体延年,莫斯之贵。谨奉一束,以助彭祖之术。”<sup>[2](P375)</sup>曹丕在诗中针对九月草木凋枯景象,产生人生苍凉的感慨,记录了九月九日宴饮的生活习俗,以秋菊独荣寄寓延年益寿的祝愿,这些与重阳节的生活文化紧密联系。

《艺文类聚》卷4引周处《风土记》:“九月九日,律中无射而数九,俗尚此月,折茱萸房以插头,言辟除恶气而御初寒。”周处是西晋初期人,西晋建于公元265年,这就可以判断,早在公元265年就有九月初九人们头插茱萸的习俗,并赋予其“除恶气”的功能。

东晋葛洪《西京杂记》卷3记载的九月九的风俗更为详细、完整,成为后世重阳节传统的定型文本。“戚夫人侍儿贾佩兰,后出为扶风人段儒妻。说在宫内时,见戚夫人侍高帝,尝以赵王如意为言,而高祖思之,几半日不言,叹息凄怆,而未知其术,辄使夫人击筑,高祖歌《大风诗》以和之。……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华酒,令人长寿。菊华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华酒。”<sup>[3](P146)</sup>东晋干宝《搜神记》记载:“戚夫人侍儿贾佩兰,后出为扶风人段儒妻。说在宫内时,尝以弦管歌舞相欢娱,竞为妖服,以趋良时。十月十五日,共入灵女庙,以豚黍乐神,吹笛击筑,歌《上灵之曲》。既而相与连臂,踏地为节,歌《赤凤皇来》。乃巫俗也。至七月七日,临百子池,作于阗乐。乐毕,以五色缕相羁,谓之相连绶。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户,竹下围棋,胜者终年有福,负者终年疾病,取丝缕,就北辰星求长命,乃免。九月,佩茱萸,食蓬饵,

饮菊华酒,令人长命。菊华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华酒。正月上辰,出池边盥濯,食蓬饵,以祓妖邪。三月上巳,张乐于流水。如此终岁焉。”<sup>[4](P17~18)</sup>干宝是河南上蔡人,上蔡被誉为重阳节的起源地,至今保留着丰富的重阳节传统生活习俗,并与上蔡的地方历史、地名景观联系紧密。干宝这篇文字记录了贾佩兰一年中不同时间的活动,其在“九月,佩茱萸,食蓬饵,饮菊华酒”,显然,九月九日的民俗意义在于“长命”“长寿”。该文详细记录了菊花酒酿制细节,即,经过一年菊花茎叶与“杂黍米酿之”,到“九月九日始熟”,这种酿造菊花酒的方法能够发挥“令人长命”的特殊功效。九月九酿造菊花酒,后来演化成酿酒人遵循的传统,并且在九月九祭拜酒神杜康。葛洪与干宝为同时代人,记载流传在九月九的传说、生活习惯,彼此之间有借鉴,也有影响。这解释了九月九的风俗起源不足以确认其历史始点,只能说在西汉时期九月九的生活实践构成了稳定的传统知识谱系,其具有“长命”的习俗功能,得到民众的普遍接受。

陶渊明在《九日闲居》序中说:“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这里提到秋菊和酒,与同时代有关“重九”饮酒和赏菊习俗的记录一脉相承。《陶渊明传》记载:“尝九月九日出宅边菊丛中坐,久之,满手把菊,忽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归。”<sup>[5](P8)</sup>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记载:“九月九日,四民并籍野饮宴。”<sup>[6](P60)</sup>也就是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九月九日赏菊、饮宴等生活习俗,已经得到民众的普遍遵循。

从三国到魏晋文献记录来看,九月九作为特殊时间被赋予重要意义的记录,应该比曹丕的诗文要早。这种推测在吴均《续齐谐记》中得到了佐证。“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长房谓之曰:‘九月九日,汝家当有时厄,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绛囊盛茱萸从系臂,登高饮菊花酒,此祸可消。’景如言,举家登山,夕还家,见鸡狗牛羊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代之矣。’今世人九日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盖始于此。”<sup>[7](P4)</sup>吴均为南朝梁人,费长房与桓景是东汉末期人,他们又是汝南的乡党,因此,九月九风俗来历与桓景连起来,似乎包含了乡党的感情因素。但是,抛开这种因素,这段记录意味着汉代有九月九日的习俗,文中谈到九月九“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盖始于此”,有一定道理。北宋高承认为:“九日登高,始于桓景。”<sup>[8](P438)</sup>也就是说,九月九习俗在汉代以前已有流传,但是,细究起来,九月九作为特

殊时间的传统可以追溯更远。

甲骨卜辞记载:“戊,贞其告秋□于高祖夔。”<sup>[9](P121)</sup>《礼记·月令》载:“(孟秋之月),是月也,农乃登穀。天子尝新,先荐寝庙。”<sup>①</sup>甲骨卜辞与《礼记》记载了“秋”“孟秋”时节“天子尝新,先荐寝庙”,也就是说,秋天丰收,要祭祀先祖。《诗经·周颂·丰年》云:“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孔颖达疏解云:“《丰年》诗者,秋冬报之乐歌也。谓周公、成王之时,致太平而大丰熟,秋冬尝、烝,报祭宗庙。”<sup>[10](P1325)</sup>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秋祭习俗,即秋天丰收祭祀先祖神灵。唐德宗李适曾在九月九日赐宴曲江亭,作重阳六韵诗:“乾坤爽气满,台殿秋光清。朝野庆丰年,高会多欢声”。唐代九月九的生活习俗与秋天庆祝丰收联系在一起,重阳节期间呈现出“朝野庆丰年”的景象。今天,重阳节秋祭传统在许多地方被保留下来了。比如,深圳《宝安县志》记载:“农历九月初九为头阳,九月十九为二阳,九月二十九为三阳。重阳在宝安为秋祭日,主要是全族公祭祖先,费用由族中公偿田产所得支出。族长及辈分高的老人可乘轿,其余的人步行跟随至墓地。祭品丰盛,祭仪隆重,规矩讲究。祭仪由族长或辈分高的老者主持,众人肃立于墓地堂前,拜祭分三献三跪九叩首。拜祭完后将祭品带回祠堂拜祭祖宗灵位,然后分‘丁肉’,男人每人可分得猪肉一份。”<sup>[11](P769)</sup>从这些记载来看,秋祭属于重阳节的重要来源。

重阳节与秋祭有关,佩戴茱萸、登高等习俗是九月九日生活实践在发展过程中不断累加、丰富的结果。《旧唐书》记载:“汉崇上巳,晋纪重阳。”<sup>[12](P249)</sup>汉代人重视三月三(上巳),晋代人重视九月九(重阳),九月九日增加了“登高、宴会、祝寿”等内容。如《晋书》卷29《礼志》记载:“汉仪,季春上巳,官及百姓皆褰于东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而自魏以后,但用三日,不以上巳也……九月九日,马射。或说云‘秋金之节,讲武习射,像立秋之礼也’。”<sup>[13](P679)</sup>《南齐书》卷9记载:“九月九日马射,或说云‘秋金之节,讲武习射’,像汉立秋之礼。史臣曰:‘案晋中朝元会,设卧骑、倒骑、颠骑,自东华门驰往神虎门,此亦

角抵杂戏之流也。宋武为宋公,在彭城,九日出项羽戏马台,至今相承,以为旧准。’”<sup>[14](P150)</sup>九月九日增加了骑射传统,是当时盛行乡射礼俗生活的再现。重阳节骑射传统在唐代盛行,尤其在朝廷,皇上亲自参与。据《唐会要》卷26记载,唐太宗曾赐文武五品以上官员在玄武门骑射,“贞观十六年九月九日,赐文武五品以上射于玄武门”<sup>②</sup>。唐太宗有一年重阳赐射,萧璃射出多支箭,均没射中。欧阳询即兴作诗取笑:“急风吹缓箭,弱手取强弓。欲高反复下,应西还更东。十回俱着地,两手并擎空。借问谁为此,乃应是宋公。”重阳节的骑射传统在宋代得到延续,宋仁宗庆历四年,“以重阳曲宴近臣、宗室于太清楼,遂射苑中”<sup>③</sup>。

敬老、尊老重阳节的重要传统。东晋宁康三年(公元375年)九月九日,“孝武帝尝讲《孝经》,仆射谢安侍坐,尚书陆纳侍讲,侍中卞耽执读,黄门侍郎谢石、吏部郎袁宏执经,胤与丹杨尹王混摘句,时论荣之”<sup>[15](P1027)</sup>。这与《西京杂记》中有关九月九日“敬老”“孝老”的记载是一致的。

通过上面的梳理,笔者以为,尽管《续齐谐记》中记录的汉代桓景时期九月九习俗包含今天重阳节的核心传统,但是吴均记录的是传说故事,所以,笔者更愿意相信九月九生活习俗在晋朝已经成熟,并且形成了重阳节传统的基本结构模式。

重阳节起源与秋祭有关,与时令有关。同时,每个地域和民族的重阳节在起源问题上也会出现不一样的面相,有的可能是传播的,有时是以汉人社会为主的重阳节的起源,但是,有的地区或者民族,重阳节起源的地区性或民族性强些,有的则表现为多民族生活习俗的交流交融。据《金史·礼志》记载:“金因辽旧俗,以重五、中元、重九日行拜天之礼。”当契丹入主中原,“重九日”祭天习俗逐渐融入中原重阳节习俗,构成此时契丹人重阳生活传统。“九月九日,国主打团斗射虎,少者输重九一筵席。射罢,于高地处卓帐,与番汉臣登高,饮菊花酒。出兔肝切生,以鹿舌酱拌食之。北呼此节为‘必里迟离’,汉人译云‘九月九日也’,又以茱萸研酒,洒门户间辟恶。亦有人盐少许而饮之者。又云男摘二九粒,女一九

① 《礼记》,见《黄侃手批白文十三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8页。

② 王溥:《唐会要》卷2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秦蕙田:《五礼通考》卷14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粒,以酒咽者,大能辟恶。”<sup>①</sup>显然,对于进入中原的契丹人来说,其重阳节习俗已经有登高、饮菊花酒、用茱萸避邪了。同时,还保留了契丹人原有的“重九日”骑射和以酒咽盐粒辟恶的生活传统。中原人在重阳节将茱萸佩戴在身上,或系在手臂上,或插在头上辟邪,契丹人则将用茱萸研制的酒洒在门户间辟邪驱灾,这些足以显见我国重阳节在多民族融合中的传承发展,其起源也表现出多种文化适应、接受和融合的特征。在贵州仁怀县茅台镇,每年农历九月九日,众人登高时,酒房就开始投料,这是茅台镇的传统。据说九月九阳气旺盛,能够酿出好酒。以前每当酿出头道酒,酒肆老板就要在酒房设置“杜康先师之神位”,摆上祭品,焚香点烛,祭品有一只公鸡、一块猪肉,以祈祷这一年酿酒顺利。<sup>[16](P79)</sup>九月九酿酒的传统在茅台镇至今犹存。陕北地区,“九月九为重阳节,俗谓‘九月九,家家有’,是日,家家吃荞麦圪凸或荞面烙饼,也有以煎饼、蒸馍过节者”<sup>[17](P732)</sup>。

我国重阳节地方性和民族性鲜明,其起源存在多样化特点,但是,无论呈现怎样的差异,重阳节的核心传统在多民族、多地域中保留下来,围绕重阳节核心传统构成的重阳节文化谱系,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和多样性,也体现了以重阳节为中心,多民族交融的文化活动。

## 二、意义指向:重阳节的核心要素

重阳节文化谱系构成是多元性的,也是长期性的,是基于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生活需要建立起来的。在重阳节文化谱系构成及其意义指向中,核心传统要素显得特别重要。

九月九是重阳节的时间传统,这个时间具有文化意义。西周初年,人们认为九为阳数,《周易》即以阳爻为九。同时,九月九日是二九相重,因此,人们称为“重阳”。南宋吴自牧在《梦粱录》里说:“日月梭飞,转瞬重九。盖九为阳数,其日与月并应,故号曰‘重阳’。”九是最大的数字,将九月九日作为重阳节,饱含人们祈愿生命健康、去掉灾祸的民俗心理,也传递了对于精致生活的向往。

登高是重阳节富有生命实践和情怀的内容,有人将重阳节称为“登高节”。以重阳节登高为题的诗文在中国文学中有许多名篇。杜甫《登高》:“风急天

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这首诗是杜甫大历二年(公元767年)重阳节登高时创作,诗歌描写自然秋色,融入诗人感时伤世以及寄寓异乡的悲苦。吴均《续齐谐记》记载九月“九日登高饮酒”。登高避祸是重阳节的核心要义。晋朝周处《风土记》将重阳节誉为登高会,“以重阳相会,登山饮菊花酒,谓之登高会,又云茱萸会”。南朝刘宋孙诜《临海记》记载:“郡北四十步有湖山,山甚平正,可数百人坐,民俗极重,每九日菊酒之辰,宴会于此山者,常至三四百人。”《南齐书》卷9说刘裕在彭城,九月九日游项羽戏马台,“至今相承,以为旧准”。唐代孙思邈《千金方·月令》曰:“重阳之日,必以肴酒登高眺远。为时宴之游赏,以畅秋志。”重阳节登高除了登山之外,还有登塔、登台、登岗以及登寺等。

重阳时节,天朗气清,是登高望远、饱览秋色的大好时机。各地均有登高的固定场域,此时,人们纷纷外出登临这些高地。河南上蔡县城西南芦岗有蔡侯玩河楼,该楼高踞蔡国古城之上。登上楼台远眺,西面嵯峨翠峰插云,东面洪河蜿蜒若带,周围数十里村落、田亩、丘陵、林木、道路、沟渠,均历历在目。<sup>[18]</sup>明清以来,经常有人到此登高赋诗。清人李士英就有《重阳偕友登玩河楼》:“拟准重阳结队游,携樽同陟玩河楼。千林落叶随风走,万里长江贴地流。林圃雨余鸭噪晚,关山霜冷雁鸣秋。茱囊菊瓮年年有,催得诗人尽白头。”<sup>②</sup>

重阳节放风筝传统在我国一些地方盛行。河南《清丰县志》记载“重阳士大夫仿古遗事,率登高饮菊花酒,儿童放纸鸢为戏”;陕西《城固县志》记载“九月儿童登高,竞放风筝,曰迎寒”;<sup>③</sup>广东《平远县志》记载“北地清明放风筝,南方重阳风力始遒上,以此日放纸鸢”。人们将各种动植物造型放飞天空,祈愿身体健康、生活平安。

重阳节期间可以通过多种方式避免灾祸。在人们的观念里,人有灾祸,牲畜也有灾祸,于是,人们开始放养牲畜,让其避开灾祸。在我国一些地方,九月九日要将牲畜散放野外。安徽《怀宁县志》记载:“九月九日乡俗多以糖饴巨胜杂黏米为糕糍饷食,且以饲牛而放牧之。谚云:‘九月重阳,散放牛羊。’自后

① 叶隆礼:《契丹国志》卷27,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上蔡县地方史志办公室:《重修上蔡县志》卷7,2005年。

③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上),岳麓书社2013年版,第198页。

弛牲畜之禁,听逐水草焉。”广西《隆安县志》曰:“九月九日,牛羊放纵。”吉林《桦甸县志》记载:“初九日,乡间多于是日祀胡、黄二仙。家畜牛马各牲,此后可以任便放野,俗谓‘撒群’。”牲畜放野习俗的来源与《续齐谐记》有直接关系。家畜关在栏里暴死,民众将牲畜放于野外,能使其免于灾祸。

重阳糕是重阳节传统食品,其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名称和制作方法。汉朝叫蓬饵。《玉烛宝典》曰:“九日食饵,饮菊花酒者,其时黍稷并收,因以黏米嘉味,触类尝新,遂成积习。”《太平御览》引《齐人月令》:“重阳之日,必以糕酒眺迺,为时宴之游赏,以畅秋志。酒必采茱萸、甘菊以泛之,既醉而还。”<sup>①</sup>这里的“糕”就是重阳糕。《唐六典》和《食谱》记载唐朝重阳节食麻葛糕和米锦糕。明清时期人们在重阳节吃花糕。《帝京岁时纪胜》说,“京师重阳节花糕极胜。有油糖果炉作者,有发面垒果蒸成者,有江米黄米捣成者,皆剪五色旗以为标帜。市人争买,供家堂,馈亲友。小儿辈又以酸枣捣糕,火炙脆枣,糖拌干果,线穿山楂,绕街卖之。有女儿之家,馈酒礼,归宁父母,又为‘女儿节’云”。重阳糕是重阳节的主要食品,重阳节时女儿要回娘家食用重阳糕。无论翻新花样有多少种,重阳糕总少不了一个“糕”字,这个“糕”字很重要,它在这里已经具有了巫术的象征意义了。按民众的说法,重阳糕与重阳节登高习俗有关,人们用“糕”与“高”的谐音表达他们驱邪逐疫的心理诉求。诚如明高濂《遵生八笺》卷5引《吕公记》云:“九日天明时,以片糕搭儿女头额,更祝曰:‘愿儿百事俱高’,此古人九日作糕之意。作三声。”

重阳节登高不仅是生活实践,而且包含节令的预兆功能。据《宋史·河渠志》记载:“说者以黄河随时涨落,故举物候为水势之名:自立春之后,东风解冻,河边入候水,初至凡一寸,则夏秋当至一尺,颇为信验,故谓之‘信水’。……九月以重阳纪节,谓之‘登高水’。”北宋时期称黄河九月的水势为“登高水”,重阳登高与“纪节”相联,拓展了登高的意义,也表现了重阳节登高的生活影响力。

赏菊、饮菊花酒是重阳节的重要生活,与人们祈愿长寿有内在联系。《荆楚岁时记》记载:“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寿。”茱萸味辛苦,可以除风散寒,止疼;菊花有浓厚的香气,能够除风明目解毒,用之泡酒,可活血理气。人们相信菊花

“辟邪”“长寿”。《本草纲目》说:“菊,春生夏茂,秋花冬实,备受四气,饱经霜露,叶枯不落,花槁不零,味兼甘苦,性禀平和。”人们在药理特性、保健功效上赋予菊花神奇的想象,比如,《神仙传》记载“康风子服甘菊花、柏实散,乃得仙”。唐代人有“无菊不重阳”的风习。重阳节赏菊,头上插菊,香包藏菊,泡菊花水,做菊花糕,酿菊花酒等,菊花成为长寿成仙的吉祥物,满足人们驱邪迎吉的心理需求。王维《奉和圣制重阳节宰臣及群官上寿应制》:“四海方无事,三秋大有年。百生无此日,万寿愿齐天。芍药和金鼎,茱萸插玳筵。玉堂开右个,天乐动宫悬。御柳疏秋景,城鸦拂曙烟。无穷菊花节,长奉柏梁篇。”九月九被称为“菊花节”,是唐代重阳节重视菊花的写照。《东京梦华录》卷8记载:“九月重阳,都下赏菊,有数种,其黄白色蕊若莲房曰‘万龄菊’,粉红色曰‘桃花菊’,白而檀心曰‘木香菊’,黄色而圆者曰‘金铃菊’,纯白而大者曰‘喜容菊’,无处无之。酒家皆以菊花缚成洞户。都人多出郊外登高,如仓王庙、四里桥、愁台、梁王城、砚台、毛驼冈、独乐冈等处宴聚。前一二日,各以粉面蒸糕遗送,上插煎彩小旗,掺钉果实,如石榴子、栗子黄、银杏、松子肉之类。又以粉作狮子、蛮王之状,置于糕上,谓之‘狮蛮’。诸禅寺各有斋会,惟开宝寺、仁王寺有狮子会。诸僧皆坐狮子座上,作法事讲说,游人最盛。”<sup>[19][P221]</sup>这段文字记录了北宋时期重阳节的生活,尤其是北宋汴京赏菊花、登高等活动。明代张岱《陶庵梦忆》记载:“兖州缙绅家风气袭王府。赏菊之日,其桌、其炕、其灯、其炉、其盘、其盒、其盆盎、其肴器、其杯盘大觥、其壶、其帏、其褥、其酒、其面食、其衣服花样,无不菊者。夜烧烛照之,蒸蒸烘染,较日色更浮出数层。席散,撤苇帘以受繁露。”明代兖州重阳节赏菊之日,菊花似锦,绚丽多姿。清代人们热衷于重阳节赏菊。如《燕京岁时记》记载:“九花者,菊花也。每届重阳,富贵之家,以九花数百盆,架庑广厦中,前轩后檐,望之若山,曰‘九花山子’。四面堆积者,曰‘九花塔’。”从这些记载来看,在重阳节传统中菊花从未缺席,并且传达了重阳节的主要意义。

赏菊颐养性情,饮菊花酒以及登高均饱含祈愿健康长寿、消除灾祸,因此,在我国许多地方,重阳节又叫“祝寿节”。壮族民间视九月九为吉日,家家给老人准备寿米。凡当年满六十岁者,其子孙均在此

① 李昉:《太平御览》卷3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日为之安排一个放粮的“寿米缸”。缸高两尺,口小腰圆,缸盖下压着红纸或红布,平时里面总有几斤米,不能断,表延年益寿。此后每年此日,皆给缸添新粮,装满为止。寿米缸放老人床腿边或神龛里。节日的时候,晚辈都要来看望老人,选最好的白米倒入缸中。已嫁女要带一些新米回娘家,添入缸,叫“养缸”。此缸平时不能动,仅做寿时才能掏出一些米,煮干饭敬老人。重阳节期间,家家杀鸡宰鸭,儿女给老人敬酒,祝愿健康长寿。老人亦从缸里拿些米出来,连同糯米,做成粽子和糍粑,飧子孙和亲友们,以与众人共享福寿。<sup>[20](P364)</sup>

重阳节骑射传统出现在魏晋南北朝。北周时期是我国民族大融合时代,在此期间,重阳节被吸收并增加了新内容。《北周诗》卷1中王褒《九日从驾诗》曰:“黄山猎地广,青门官路长。律改三秋节,气应九重霜。射马垂双带,丰貂佩两璜。苑寒梨树紫,山秋菊叶黄。华露霏霏冷,轻飏飒飒凉。终惭属车对,空假侍中郎。”<sup>[21](P362)</sup>黄山围猎发生在“山秋菊叶黄”时,这是北方民族的生活传统。《全唐诗》卷103载赵彦昭《奉和九日幸临渭亭登高应制》曰:“秋稼凝仙览,宸游转翠华。呼鹰下鸟路,戏马出龙沙。紫菊宜新寿,丹萸辟旧邪。须陪长久宴,岁岁奉吹花。”唐中宗君臣在重阳节期间登高饮菊花酒,佩戴茱萸,狩猎。《太平御览》卷32引《豫章记》载:“龙沙在郡北带江,沙甚洁白,高峻而陂,有龙形,俗为九日登高处。”重阳节的发展过程是多民族接受、融入生活传统的过程,由此形成以重阳节为核心的多民族共享生活传统。

《梦粱录》记录重阳时日,“世人以菊花、茱萸,浮于酒饮之,盖茱萸名‘辟邪翁’,菊花名‘延寿翁’,故假此两物服之,以消阳九之厄”<sup>[22](P56)</sup>。“阳九之厄”与“桓景之厄”有关,这种消除灾难、规避厄运的传说流传广泛。如流传在青海祁连县的重阳节传说,“东汉时期,汝河有个瘟魔,只要它一出现,家家就有人生病,天天有人丧命,这一带老百姓均受尽了瘟魔的蹂躏。一场瘟疫不仅夺走了恒(桓)景的父母,而且他自己也差点儿丧了命。恒(桓)景病愈后,辞别了妻子和乡亲,决心访仙学艺,为民除掉瘟魔。恒(桓)景访遍名山高士,终于打听到东方一座最古老的山上有一个法力无边的仙长。在仙鹤指引下,仙长终于收留了恒(桓)景。仙长除了教他降妖剑术外,又

赠他一把降妖剑。恒(桓)景废寝忘食地苦练功夫,终于练成了一身武艺。有一天,仙长把恒(桓)景叫到跟前说:‘明天九月初九,瘟魔又要出来作恶。你本领已经学成,该回去为民除害了。’仙长送了恒(桓)景一包茱萸叶、一盅菊花酒,并且密授辟邪用法,让恒(桓)景骑着仙鹤赶回了家。九月初九早晨,他按仙长的叮嘱,把乡亲们领到了附近的一座山上,然后发给每人一片茱萸叶、一杯菊花酒。中午时分,随着几声怪叫,瘟魔冲出汝河,刚刚扑到山下,突然吹来一阵阵茱萸奇香和菊花酒气。瘟魔戛然止步,脸色突变,恒(桓)景手持降妖剑追下山来,几个回合就把瘟魔刺死了。从此,九月初九登高避疫的风俗便年复一年地传下来”<sup>[23](P58)</sup>。这个流传在我国青海的重阳节传说实质上是东汉桓景与重阳节关系的当代版本,故事将“桓景”说成“恒景”,像这类重阳传说在我国内蒙也有流传。<sup>①</sup>民间口头讲述与历史文献记录中的一些人名、地名因为字形或读音相近而发生变异,这是民间口头传统的特点。这类重阳节来历的解释构成了多民族关于重阳节来历的认知。

重阳节核心传统不是虚空的,而是饱含情感的生活实践,尊老、敬老传统,驱邪去厄习俗,祈福健康,是中华民族普遍遵守、信奉的理念,具有跨越时空的巨大力量,包含了中华民族共有的普遍价值理念,也蕴含了丰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意识。

重阳节核心传统因在多民族生活中的实践而呈现出交流、交往、交融的关系,彼此借鉴、互动频繁,在交往过程中表现为“礼”与“俗”之间的互动,不同民族、地域之间的互鉴,由此形成重阳节多元化、多层次的文化特色。

### 三、品牌建设行动:重阳节传统的当代实践

重阳节传统习俗很多,这些习俗构成重阳节的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但是,在重阳节品牌建设过程中,许多重阳节关键性象征符号不能够进入其中。文化品牌建设主要彰显的是聚焦核心,包含普遍价值符号体系,因此,重阳节品牌建设就是适应当下生活符号价值的选择,其中,尊老、敬老、孝老传统成为重要的意义旨归,也是重阳节品牌建设的重要内容。

重阳节尊老、敬老传统尽管在不同时代有许多变化,但是,作为重阳节核心传统,从未发生动摇。

① 铁木尔布和:《准格尔旗民间故事》,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28页。



南北朝时期九月九日讲《孝经》，唐代盛行“祝寿宴”。《荆楚岁时记》隋杜公瞻注云：“九月九日宴会，未知起于何代，然自汉至宋未改。今北人亦重此节，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近代皆设宴于台榭。”此时，重阳节核心意义就是祈愿长寿。重阳节尊老、敬老传统成为核心。宋代将重阳节的菊花称为“迎寿客”，清代皇室每年重阳节要举办“千寿宴”。今天，我国许多民族将重阳节作为敬老节传承，围绕敬老祈寿举办系列活动。广西壮族、汉族、毛南族、瑶族、侗族、仫佬族、仡佬族、京族、水族亦在特殊年龄和重阳节盛行“补粮敬老”习俗。壮族的补粮习俗，亦称“添粮”“盘粮”“天粮”，也就是“补寿”。补粮从49岁(虚岁)开始，每隔12年举行一次。由外嫁女儿各带一小袋米，在家中依次“运粮”入“魂米筐”，为老人添“魂粮”；每年农历九月初九，外嫁女儿各带一个“寿粮包”，给61岁以上老人房内的“寿米缸”添粮，为老人祈福祝寿。<sup>[24]</sup>

敬老、尊老，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陕西各地每年重阳节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孝敬老人、帮助老人、关爱老人，并且以多种方式祈愿老人健康长寿。2006年，重阳节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年12月28日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每年农历九月初九为老年节”，这为弘扬尊老、敬老传统提供了法律保障。

重阳节活动丰富，包含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并且与当代民众生活紧密相关，祈愿生命健康，提升生活质量。重阳节品牌营建应该让民众有充足时间、精力投入到关爱老人、提高生命健康的活动中来，这就需要政府实行重阳节放假制度。历史上重阳节放假是有先例的。唐朝重阳节皇帝常在宫中举办宴饮活动。唐高宗李治对于九月九表现出特别偏爱，“凤阙澄秋色，龙闱引夕凉”，每逢九月九要举行以“祝寿”为主题的活动。武则天的生日是九月九，称帝登基日是九月九，她使用“长寿”作为年号。由于九月九的特殊意义，李泌率领群臣奏请唐朝德宗皇帝将九月九日设置为重阳节，德宗欣然同意。“九月九日……宜任文武百僚择胜地追赏。每节宰相、常参官共赐钱五百贯文，翰林学士一百贯文，左右神威、神策等十军各赐五百贯，金吾、英武、威远及诸卫将军共赐二百贯，客省奏事共赐一百贯，委度支每节前五日支付，永为常制。”<sup>[12](P249)</sup>至此，重阳节在唐朝作为法定节日被固定下来。今天，春节、清明、端午、中秋均为我国法定假日。重阳节实行放假制度，不仅

符合历史传统，而且满足民众生活情感需求。

重阳节登高是祈愿，也是锻炼。不同地区、民族生活的具体环境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重阳节登高主要包括山、岗、丘、岭、亭、阁、楼、祠、庙、观、墩、岩、城墙、高台、古寺、古塔等。浙江沿海渔民九月九盛行“爬船杆”比赛，“重阳，石塘渔民则以比赛攀爬桅杆为娱乐”<sup>[25](P821)</sup>。重阳节登高习俗无论在民众心理上，还是民俗实践上均具有生命力，包含民众对生命精神的不懈追求，以及消祸去晦、祛邪避灾的意义。《燕京岁时记》记载：“京师谓重阳为九月九。每届九月九日，则都人士提壶携榼，出郭登高。南则在天宁寺、陶然亭、龙爪槐等处。北则蓟门烟树、清净化城等处，远则西山八刹等处，赋诗饮酒，烤肉分糕，洵一时之快事也。”<sup>[26](P34)</sup>随着时代发展，重阳节登高习俗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今天，人们取登高的实践、实用之义，即强身健体、郊游散心、调节生活节奏。因此，重阳节品牌建设应将登高的民俗意义和实践功用结合起来，使重阳节登高兼具强身健体与驱厄求吉意义。

赏菊、品菊、饮菊花酒作为重阳节核心传统，成为品牌建设不可或缺的对象。《水浒传》第七十一回写道：“重阳节近，宋江便叫宋清安排大筵席，会众兄弟同赏菊花，唤做菊花之会。”<sup>[27](P821)</sup>《梦粱录》卷5记载：“盖九为阳数，其日与月并应，故号曰‘重阳’。”“年例，禁中与贵家皆此日赏菊，士庶之家，亦市一二株玩赏。其菊有七八十种，且香而耐久，择其优者言之。”这些不同种类的菊花在重阳节供人们观赏、购买。《清嘉录》记载苏州赏菊活动时说，“畦菊乍放，虎阜花农已千盂百盂担入城市。居人买为瓶洗供赏者，或五器、七器为一台，梗中置熟铁线，偃仰能如人意。或于广庭大厦，堆垒千百盆为玩者，绉纸为山，号为菊花山。而茶肆尤盛。”<sup>[28](P144)</sup>宋代把重阳节称为菊花节。可见，历史上的重阳节，菊花是最重要、最有内涵的民俗植物。今天，许多地方在九月九举办菊花诗会或菊花展，菊花遍布在城市乡镇的公共空间，不仅美化环境，而且供游人观赏，成为拉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文化力量和地方文化品牌建设的重要内容。

重阳节品牌建设是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举措，也是以尊老、敬老为中心的生活秩序建构实践。重阳节包含规范社会秩序、生活秩序的功能，不仅在民间社会，而且在官方得到了很好的利用。据《宋史·嘉礼四》“上巳、重阳赐宴仪”条载：

其日，预宴官以下并赴宴所就次，诸司排设

备,预宴官以下诣庭中望阙位立。次中使诣班首之左,稍前立,中使宣曰“有敕”,在位官皆再拜讫。中使宣曰“赐卿等御筵”,在位官皆再拜,执笏舞蹈,又再拜。中使退,预宴官分东西升阶就坐。

酒行,乐作;食讫、食毕,乐止。酒五行,预宴官并兴就次,赐花有差。少顷,戴花毕,预宴官诣望阙位立,谢花,再拜讫,复升就坐。酒行,乐作;饮讫、食毕,乐止。酒四行而退。

皇帝在皇宫举办重阳宴会,以品阶排列座次,大臣依礼享受重阳宴。这是皇宫的规矩,是为官者要遵守的秩序。重阳节品牌建设应充分利用其在传统社会秩序建构、社会道德文明建设中的丰富资源,以尊老、敬老为核心,与当下民众生活紧密结合,推进乡风文明建设。新时代,重阳节品牌建设应以民众生活为中心,弘扬重阳节尊老、敬老传统,创新重阳节文化表达形式,从整体上推进重阳节生活传统的现代传承。

#### 四、结语

重阳节传统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民众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创造和实践的智慧结晶,具有层累特性,表现为多地域、多民族的共同创造。

新时代,重阳节品牌建设应符合当代人的审美价值、生活观念以及文化主体性价值选择。其中,以重阳节核心传统为中心的品牌塑造,成为当代人生活的呈现。实现重阳节品牌建设的个性化,制定以重阳节核心价值为主的品牌建设系统,重阳节品牌建设的表达者、组织者成为不断对重阳节进行重构的推动者、实施者。各地利用重阳节品牌增强区域性凝聚力和扩散力,重阳节品牌建设成为区域社会发展的强大文化力量,是实现重阳节现代传承的重要方式。

品牌建设是重阳节现代传承的重要方式,更多考量的是社会经济行为、地方营销行为,包含重阳节

核心传统的包装、建构意涵当代人的生活方式。因此,重阳节品牌建设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重阳节+品牌的知识生产模式。

#### 参考文献:

- [1]楚辞[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
- [2]陈元靓.岁时广记[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 [3]葛洪.西京杂记[M].周天游,校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 [4]干宝.搜神记[M].长沙:岳麓书社,2015.
- [5]陶渊明集[M].逯钦立,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
- [6]宗懔.荆楚岁时记[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 [7]吴均.续齐谐记[M].北京:中华书局,1934.
- [8]高承.事物纪原[M].北京:中华书局,1989.
- [9]吴浩坤,潘悠.中国甲骨学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 [10]孔颖达.毛诗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11]宝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宝安县志[Z].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
- [12]刘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9.
- [13]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6.
- [14]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 [15]房玄龄.晋书[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
- [16]黄雷,雷学华.长江流域的岁时节庆[M].武汉:长江出版社,2015.
- [17]子长县志编纂委员会.子长县志[Z].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 [18]尚伟.重阳节的起源地——上蔡[J].中州古今,2002(2).
- [19]孟元老.东京梦华录[M].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6.
- [20]李耀宗.中华节日名典[Z].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8.
- [21]蒲积中.古今岁时杂咏[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9.
- [22]吴自牧.梦粱录[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
- [23]马丽雯.海北州民间故事全集(祁连卷)[M].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2015.
- [24]许晓明.壮族补粮敬老习俗[J].民族艺术,20020(6).
- [25]温岭县志编纂委员会.温岭县志[Z].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
- [26]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
- [27]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下)[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8.
- [28]顾禄.清嘉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特约编辑 桑俊

责任编辑 叶利荣 E-mail:yelirong@126.com